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七期 ——  
(二〇〇五年二月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2a)

---

【各抒己见】讨论文化革命 (上)	扬 帆等
【史料辨析】是谁引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欧阳龙门
【史海钩沉】“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	余汝信
【运动记愧】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我为什么残忍？	鲍河扬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各抒己见】

### 讨论文化革命 (上)

• 扬 帆等 •

杨帆：我们的讨论正在创造新的经验，应该不断总结和提高。第一，必须降低成本，提高讨论效率。特别是提前准备，重点发言，围绕重点，关键是利用网络，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的成本毕竟太高了。应该充分利用会前会后的网上讨论。这需要大家充分配合，及时参与，手勤。目前经济学极右派大多数获得了国内外企业和基金的支持，实际上可以利用经济力量垄断学术讨论。多亏有网络，可以降低成本，打破他们的垄断，网络真是革命性的。

第二，讨论中反对以资格压人，反对话语霸权。大家不是一个学科的，讨论问题唯一的规则，就是形式逻辑。不要以为都是大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一个裁判，自己不发言，专门挑毛病。说话必须符合形式逻辑，一是概念同一，大家讨论的必须是同一个问题，不能够转移概念，搞诡辩，有些人在讨论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偷换概念，有意搅局，上海话叫“捣糨糊”；第二是论据必须真实；三是论证必须符合逻辑。

第三，讨论的目的是澄清问题，这比吵架更有力。大家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不可能说服谁改变立场，也不能以势压人，关键是澄清观点，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争论点在哪里？有

没有真正的分歧？大家都认为整合思想有必要，整合不是谁压倒谁，面对面澄清问题。因为各说各话，互不见面，在写文章时往往避开自己不利之处，专门攻击别人的弱点。我看过许多争论文章，许多是自成体系，但是互相之间似乎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不见面的害处。有些人摆出一付学阀的架子，似乎他总是很忙，开会先说话，说完就走，从来不听别人的，或者不理睬别人的质询。我有几次抓住不放，以形式逻辑澄清问题，他们很狼狈，因为一澄清他们就暴露出问题，特别是以学术为某些利益辩护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对我进行“妖魔化”，说我说话不好听，领导接受不了。其实他们那里也没有什么领导，主要是退休的领导。这说明澄清和质询的办法很有用，可以澄清混乱的逻辑和观点，也澄清背后的不同利益和假设前提。

今天讨论文化革命。大家都先看了三篇文章。一是王力雄的《毛泽东主义和人间天堂》（见本刊 z k 0 1 0 6 c——编者），他认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是如何在逻辑和历史上走向荒谬的，比附目前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如此，最后又回到计划经济。二是李宪源的，他是应王小东之约，专门从美国写文章参加网上讨论，文章非常之长，下了大工夫（指“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连载于本刊 z k 0 0 0 5 b，z k 0 0 0 5 d，z k 0 0 0 6 e，z k 0 0 0 6 g——编者）；三是崔之元（指“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见本刊 z k 9 7 0 4 b——编者）。

丁东：希望讨论马上能够抓住关键问题，我同情李宪源文章的前半部分。看到五七年右派和文化革命造反派的联系是有道理的。文革初期，刘少奇主持工作，就有重演反右的味道。后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委被夺权，群众组织林立，尽管他们的旗号都是拥护毛主席，反对刘少奇，但利益诉求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临时工、合同工造反，是要求改变低人一等的待遇；新疆的老知青造反，是要求回城；一些干部造反，是因为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想翻身；一些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造反，是因为不满官僚的特权，想让社会更平等。这和五七年右派鸣放的实际诉求有相似的一面，但旗号不一样。八十年代对文化革命的否定是由文革中下台的老干部主导的，目的首先是否定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冲击，他们要恢复文革以前的政治秩序和自己的正统地位，当时有一种呼声就是要回到八大。这是以重建官僚政治秩序否定文革的礼崩乐坏，而不是用民主自由取代个人专权。当时的领导人让人大开会取消文革期间宪法强调的“四大”。文革中的“四大”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你写大字报，批评文革的领导人，照样不受法律保护。文革中几乎所有贴了有影响的大字报的人，都付出过代价。有的甚至为写大字报坐了牢，丢了脑袋。所以“四大”不是真正的民主。“大民主”不是理想的民主格局。但现在的情况是，“四大”取消了，老百姓连个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现在一些地方竟然贴出“上访可耻”的标语，告状都找不到门。文革初期一度失控，人们可以随便办报纸，一个人也可以办一张报。现在怎么可能？当时干部害怕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有恐惧心理，以权谋私有一定顾忌，现在官员对下面基本上是有恃无恐。工人农民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代言人，受欺侮、受剥夺无法宣泻。他们没见过真正的新闻自由，于是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搞运动整干部，觉得自己当时相对的社会地位还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应当责备他们，嘲笑他们。

崔之元提出，为什么官方和自由知识分子在否定文化革命上高度一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这首先不符合事实。官方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是什么出发点？什么作法？当时对造派“三种人”处分很重，而那些红八月带头动武的高干子弟，却当作文革受害者保下来，有的发大财，有的当高官。可见他们否定文革是从本身集团利益出发的。没有一个更高更有人类普遍性的价值尺度。九十年官方就不提否定文革了，而是对反思文革重重设卡，不让开会讨论，限制出书，许多研究专著都出不来。自由知识分子反思文革是把它当作那个体制登峰造极的标本。这种反思官方历来是防范的。对造反派因积极参与文革而挨整，让不该承担文革罪责的小人物来承担文革罪责的现象，我知道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他们对历史真相很清楚，就是缺少表达机会。

我不能同意李宪源文章的后一半。文化革命的确是非常血腥的，人人自危。现在看哪个知识分子不顺眼，给他穿个小鞋，措施还是比较文雅的，那时说抓就抓，还有群众专政，法西斯色彩很浓，人身安全毫无保障。这不是妖魔化，是事实。现在司法腐败很严重，社会弱势群体很难靠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法治不好，还是人治好。人治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民主宪政下的法治的甜头虽然我们还没有尝到，但在别的国家毕竟已经成为现实。

王小东：李宪源的文章是问，责任在谁？

丁东：开始动武的是老红卫兵，后来又是他们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王东成：官方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打击了老干部，如果继续反对右派，他绝对不否定文化革命。我是文化革命的造反派。我认为，从右派到文化革命有民主因素，但是他们不敢互相认同。造反派不敢让右派加入。

文化革命只有两年，后来只是党内斗争，权力再分配，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了。前两年带有某种民主的东西，有群众对于走资派私有制的反抗，我同意毛泽东对于特权阶层的批判。直到上大学前两年都没有坚决否定文化革命。现在我坚决反对文化革命，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当时我是造反派头，当时没有摆脱毛泽东的框框，也不想摆脱毛泽东。蒯大富是根红苗正的，我是造反派，一直与红卫兵是对立的。

黎明：我是江西上大学的，1966年大学毕业，22岁参加文化革命。当时我写了大字报造反，第二天全校有1000张大字报批判我，后来是毛泽东解放了我，否则我就成为真正的右派了。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开始反思文化革命。我所有后来著作都是从反思文化革命开始的。

王东成：崔永元主持的一个节目，文化革命中一个小孩子听到老师说：林彪也是一个小爬虫，就揭发了。小孩说的是真话，但让老师挨了斗争。是谁造成的结果，节目没有点出来，但是这个节目就不让重播了。许多人看了之后要求重播。

张祥平：你们从个人角度，个人体验意义不大。我从历史角度。历史定位的现实意义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不进行历史定位，就会“不识文革真面目，只缘身在文革中”“独裁侧看像民主，大小神仙各不同”：崔之元先生《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述及的“得”，其实是“虚”的，是乌托邦，而“失”却是“实”的，是社会动乱和非人道的自相残害，所谓的“现代性重建”，是小修小改的乌托邦；与此类似，李宪源先生《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一文述及的“共通点”，其实都是把西方当成心中的理想，甚至把美化了的西方当成奋斗目标，无论哪一种，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乌托邦，无论胜者和败者，都该忏悔！即使败者上台，同样不能避免悲剧有许多右派，在40年代是左派，在50年代初“整”过40年代的右派；在文革中，“胜者革命败被革”的周期缩短了：初期的工作组压造反派，后来的造反派斗工作组，再后来军宣队和工宣队“整”造反派中的失利者（崔文述及的“大民主”、“鞍钢宪法”、“经济大民主”、“用‘解放’来超越‘规律’和‘理性’”、文革中两派形成的“社会主义两党制”等等，都是乌托邦，不可持续。）整个时代都该忏悔，忏悔历史的“歧出”，忏悔乌托邦对人心的诱惑，忏悔愚蠢的理想为那些大大小小的“神仙”提供了下蛆的缝隙。

西元8年，中国长安城内，上演了一出历史大剧：“让”皇位。西亚的耶稣已经长到了8岁，把皇位“让”出去的那个东亚皇帝只有三岁，史称“孺子婴”。他姓刘，遗传基因中有一部分来

自刘邦。然而，这个“让”，要带上引号：那个小皇帝刚刚学会说出“让”这个语音，不了解含义。所谓的“让”，只是王莽一手导演的闹剧，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的高潮。西元1966年，中国北京城内，上演了一出历史大剧：“炮打司令部”。被“打”的司令是刘少奇，也姓刘。这个“打”，也要带上引号：那个司令其实是被“批判”，所谓的“打”，只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闹剧，一场史有（！）前例的“造神运动”的开始。毛泽东与王莽的共同点是：毛泽东为了突破政治局集体决策的西式体制，不得不通过“造神”运动来“破旧立新”；正如王莽，为了突破“非刘姓不封王”的政治体制，不得不通过“造神”运动来“革汉而立新”（王先谦：《班固》汉书补注百卷，上海文瑞楼据长沙王氏校刊本印，第99卷中，第4页）。两次“立新”，都摆出一副“为人民服务”的架势，王莽恢复井田，“理论根据”是防止兼并，减少贫富分化，顺“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同上引，第5页正）；毛泽东提倡一大二公，也是减少贫富分化，顺应历史潮流，“反修防修”。为了抬高自己，王莽鼓励“敢击大臣”的人（同上，第13页正），正如毛泽东鼓励“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有了好事，就说是王政君太皇太后（王莽的姑姑）和王莽领导的伟大胜利，尤其是剪灭董贤（汉哀帝的男妾）的“光荣历史”，一定要“天天讲，反复讲”，歌功颂德；正如文革中吃碗饭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阶级斗争”天天讲，反复讲。事实不够的时候，就“掺水”，搞浮夸：王莽派人用金钱布匹去笼络（现代术语是“援助”）匈奴，对方表示感谢，就成了外交上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时代“支援世界革命”。这些事情还算“有影儿”，等到王莽派出亲信到各地“调查研究”一番之后，就判断不出“有影儿”还是“顾影自怜”了。把王莽当成大救星的民歌出来了，人民的生活都变成天堂一样了：禾苗长得一丈多长，一株粟能抽三只穗，用不着种就能接茬儿长，不用养蚕就能收茧，天上下甘露，地下冒甘泉（同上引，99卷上，第47页反）这一类宣传，在毛泽东时代，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了。文革中变本加利。王莽和毛泽东“神”了！他们可以不受原体制的政治常规约束，造神者们可以直接接受大神的任命！

“符命大臣”（同上引，99卷中，第5—6页）比科班出身的官员还气派：就像一千多年之后靠着摇笔造神而受任的“文革旗手”、“副统帅”、“文革小组组长”、“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小组成员”。王莽的政治对手要“下放”，原住长安的刘家人要迁庙；在外的刘家人也限制：当官的停职“待除于家”；毛泽东的政治对手也要“下放”，迁老干部出京，也要限制老干部上岗，不够“忠”的都“挂起来”，也是“待除于家”。王莽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对匈奴开战（同上引，第8页正）；毛泽东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在珍宝岛对苏作战。实践检验的结果同样不妙：王莽凭着主观意愿消灭差别，不顾及东亚严酷的环境资源条件，无视管理知识，不可能维护群体延续：有效的管理，一定有级差；人为取消差别，必然管理无度有效生产量下降，无效消耗量上升：“农商失业（不能正常地安居乐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抵罪者不可胜数。”（同上引）毛泽东凭着主观意愿消灭差别，同样导致管理无度，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只会“抓革命”，不会“促生产”，到了文革末期，社会的有效供给几乎成了坐吃山空的状态，所以敢抓管理的邓小平受到热烈拥护。王莽与毛泽东的结局也十分相似：“神”，变得“不神”了：一个“狂（？）”女子在长安大街上公开为刘家正名。王莽大怒，不但“收捕杀之”，而且把掌寇大夫（相当于公安局长）免了职（同上，第7页正）。正如张志新，也是女子，“文革”中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捕后仍无“悔改表现”，被割破喉咙后拉赴刑场枪决，约40岁，1980年前后“平反”（见于报刊广播，当时许多诗文以此为题材）。于是，造神者内部分化：甄丰父子“作符命复（再）作符命”。王莽大怒，下令追捕，甄丰自杀，儿子逃入华山，一年多之后被捕（同上引，第9页正）。林彪父子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甄丰父子“打着红旗反红旗”，下场也大致相同。“依靠对象”出了问题，王莽只好拉拢中间力量，封侯许愿。地图还没画好，土地就封出去了。受“封”的一家大小还得在京城靠着每月数千钱度日（同上引，第11页正）。正如文革后期的那些“民主”人士与“三结合”干部，不长工资。普通百姓不知详请，王莽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地名上大作文章。有的地方变了五次地名，最后又变回来（同上，第14页正）。正如文革中，把“府右街”改成“韶山路”，“长安街”改成“红卫兵大街”之类。人心散乱，谣言四起（同上，第14页反）。查不出来源就大开杀戒：犯法的人过去要等到秋冬问斩，王莽

“革汉而立新”：“毋须（不必）时（等到时节），尽岁止（到了年尾歇一歇），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走在路上也怀疑有人盯梢）。”（同上，卷下，第20页正）这些情景，与1976年的四五事件前后何其相似！

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人心丧尽，“神”不起来了：对王莽来说，是内攻外侵，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寿终正寝；对毛泽东来说，惩罚落在四人帮的头上，同样埋葬了造神运动。

文化革命的历史定位：史有前例。在文革期间，人们常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仿佛“史无前例”很值得夸耀。其实，“史无前例”就是生物学上的“新基因突变”。只有那些适应环境的“突变”才值得夸耀，否则一定会被淘汰，落下历史笑柄。如果“史无前例”本是“史有前例”，而且那个“前例”的下场不妙，那么就不是“新基因突变”，而是“返祖型基因突变”，是一个大大的笑柄。王莽就是这么一个下场不妙的“前例”；毛泽东不过是“返祖型基因突变”，是一个大大的笑柄像王莽时代一样，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一，有了野心家，二，社会制度限制了野心，三，现行制度有漏洞。野心家利用这些漏洞，淡化现行体制的法定约束，最后取消约束。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同样重要，次序可以随意调换。王莽极力淡化的法定约束是“非刘姓不封王”。（《史记·卷8》）

毛泽东极力淡化的法定约束是“政治局集体决策”。野心家要成功，就要把自己变为“神”，就要“造神”，然后才能够为所欲为；为了自己“神”，就要指出旧体制的不合理之处，还要调动“紧跟”人员的积极性，帮助他们以最小耗能走向高层。“神”确有“神”的合理性。不合理性在于：用乌托邦去填补旧体制的漏洞，与环境资源条件不适应。要想适应环境，只能一点一滴地把制度创新积累起来。“神”没有耐心，等不了那么久，所以就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其实是“理想”。他（她）的信徒们相信这个“理想”能够实现。有了信徒，“理想”就好像得到了“实践检验”：很多人在努力，正象很多人在爬山，既然爬到了山腰，说明有一个山顶（理想境界）。其实，一个从未实现过的理想，和一个山顶不一样：如果从未有人爬上过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员就不敢说自己能上去；如果从未有人爬上过任何一个山顶，人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山顶；正如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多数人不承认地球是圆的。“神”的理想无例外地想要“消灭差别”：减少分工分层，“一神在上，万众一心”，或是“一神在上，一团儿在中，万众在下”。凡是“神”化组织，一旦大神死去，就如鸟兽散。最残酷的情况是，死的神把“万众”带走：70年代在圭亚那森林里，“人民圣殿教”的几百个教徒就跟着教主“走”了，其中有的自愿，是自杀，有的不自愿，是他杀。1994年10月，在瑞士发生了“太阳神殿教”集体死亡事件，也是有自杀，有他杀，他杀者被反捆双手。1997年美国的“天堂之门教”集体死亡事件，没有发现他杀，但其残酷性却更骇人：有些男教徒曾经被阉割。“造神运动”造悲剧，乌托邦理想“乌（无）有托”，都从反面肯定了“公正差别”，这是历史显示出来的合理性。旧大陆中纬度地带的组织管理一定要升级，层次要增加，规则要增加，相互约束也要增加；从群内调济的部落社会，到同域分层的封建城堡社会，再到异域整合的大一统社会。想要“超越”规则和理性，“彻底解放全人类”的诉求，都是乌托邦！只会为那些大大小小的“神仙”提供下蛆的缝隙。但愿世上的“大神”全都是昨夜星辰，今后不再。

（略）

文革动因的进一步分析：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初期把引进的“内容”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改造，更多地保留了科举竞争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换成了与“先进生产力”（其实是市场竞争）无关的“半无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9页）；中国革命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离开经典的传统模式，没有背离中国传统：以（农）民为本，驱逐鞑虏（日本）。革命路径不是从工人赤卫队到红军，而是立足于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农村包围城市，开辟根

据地，吸引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科举竞争社会改朝换代的传统模式；土地改革和镇压政治反对派也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初期的传统模式。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转入西式的极端歧出，始于农业合作化。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就背离了东亚环境条件中筛选出来的长效目标：不是重农抑商，而是减少榨取农民的社会成本，利于工业化；埋下了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与列宁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不相同：毛泽东不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中间一环，是引进西方文明的一个极端的歧出，是一剂“猛药”。“是药三分毒，有病病挡，无病人挡”，何况“猛药”对毛泽东来说，个人抱负与中国传统很不相容，就连政治局成员也不理解他的个人抱负，所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造神。另一方面，毛泽东本人说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既不是德语，也不是犹太语或俄语，所以他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结果，他对自己和对别人就采取了双重标准。当双重标准的事实被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察觉之后，信用危机就不可避免。无论毛泽东用来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标准是好还是坏，都受到普遍怀疑。双重标准的源头不是毛泽东，而是近代中国的通病。强国梦源于中国本土，乌托邦源于西学，东来本土的乌托邦自王莽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直到近代。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的强国梦走到了边界：以计划经济加群众运动来超英赶美，他这一生是不可能了；经济目标必须下调为打破核垄断，“自然科学”和“技术救国”等百年数量级的传统受到普遍重视。这个下调的目标达到之后，乌托邦就占了上峰：反修防修，进而用革命“红遍世界”以十年数量级的短效传统（“大公无私”和“阶级专政”）去“破除”千年级的长效传统（“政以德”和“实事求是”），在全世界营造一个红彤彤的革命大本营。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第一重标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第二重标准是反乌托邦的：大私无公和一人独裁。（实事求是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正如经济学中广义交易与狭义交易的区别，前者注重较长时段的较复杂现象，后者通常指较短时段中的相对简单现象；在“温差水花”与“变色反应”等耗散结构现象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已经能够用无量纲的数学模型把复杂现象与简单现象沟通起来，详见拙文，载《北京农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打破核垄断，本来应该作为停下“猛药”的契机；毛泽东却加大“药量”，这时的毛泽东做完了强国梦，接着做强人梦。他个人的利己动机超越了群体利益所谓“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所谓“支援世界革命”，全都超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的群体目标，只是乌托邦（文革的第一重目标）与个人抱负（文革的第二重目标）的结合。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志士仁人，拥护毛泽东“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旗帜”，具体内容是“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对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统治”，而不是用“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阶级专政）替换蒋介石（引文见胡绩伟：《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跨入新世纪的感言》，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春季号，第53—68页）。文革前期，毛泽东的第二重标准只有极少数高级干部如林彪和康生等察觉，所以毛泽东利用他在强国路上获得的威信，把乌托邦推向高潮。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第二重标准被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觉察；他死后不久，不但四人帮迅速下狱，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也不长命：“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会《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眼人一看就不是“大公无私”，因为毛泽东死前为华国锋写过“你办事，我放心”的证明，既可以解释为“决策”，也可以解释为“指示”。如果毛泽东没有采用经济依赖型的文化覆盖，建国之初定下名分，尊扬先贤，重农抑商，颁正朔继道统，他就没有任何必要在后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革命的目的，如果把“解放全人类”改为“示范全人类”，那么，利用中国的传统资源就能顺理成章地达到：抑制官僚（走资派）害民，树立天子（毛泽东）权威。文革的这两个目标，身受其害的人常常强调后一个，理想主义的群体常常强调前一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西方青年崇拜毛泽东，是因为前一个目标，不是因为后一个目标。其实，前一个目标即使通过“造神”时期的“大民主”达到了，也不可持续文革时期与王莽时期十分雷同，清楚地显示了“造神”的恶果。

印红标：我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我担心以后的人不一定能够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因为现在流行的很多说法背离了事实，又封锁资料、设置禁区，很少有人肯下

苦功夫做细致的考据。我们这一代应该把可靠的资料收集、整理、保留下来。因此我一直在访问具体的人物，了解具体的事实。历史学家要求比较严谨。真实情况对于青年人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什么叫“造反派”？1966年8月北京开始打人的时候，几乎每条街都有人被抄家，打死过很多人。那时还没有“造反派”这个词，只有“造反精神”。造反派后来才形成，他们把自己靠向红卫兵，而老红卫兵非常不愿意说自己是造反派。“破四旧”打人主要是老红卫兵干的事。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拉倒标志性的二校门，大规模打教授是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干的，蒯大富等人的造反派组织那时还没有成立。周恩来刚给他们平反。那时他们不是反革命，也不是革命派。

现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正统解释和判断是由八十年代的领导人定的，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识。

依我看，文化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党内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乌托邦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权力的矛盾。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要批判党内务实派。要发展生产就要务实，就要有科层制度或者说官僚等级制度，给科层制度的上层既得利益者一定的特权。理想主义乌托邦指出科层制度的弊病，有认识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付诸实施就只能造成灾难。对老百姓的物质利益来说，乌托邦没有任何好处。在当时的制度下，务实就得有特权问题。

党内权力的矛盾，是具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凌驾在党之上，凌驾在党政官员或者说官僚集体之上。个人崇拜领袖的第一要务是驾御官僚，而官僚又与老百姓有阶层的矛盾，毛泽东直接调动党外社会力量参与党内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的，其条件就是10年严密的思想控制，培养了无限崇拜他个人的一代青年人。应该承认整个文化革命的主线是党内斗争。

第二个层次是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是中上层。领导层与知识分子一直存在矛盾，在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党内较少分歧。毛泽东先是发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学术地位高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后来对青年知识分子失望，又发动工人批判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有两个自杀高潮，一是破四旧，二是清理阶级队伍，那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候。而两者中间是群众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高潮，当权派日子不好过，而为了打击“走资派”，中央规定不准在群众中间包括知识分子中间打反革命。

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被两个矛盾困扰，一是担心中国出拉科西（激起群众反抗的官僚主义者），一是担心出裴多菲俱乐部（知识分子反对派）。1957年开始是要在党内整风，但是党内不断汇报说知识分子要反党，学生的言论激烈，就推动毛泽东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转向知识分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多人以为是第二次反右，是针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刘少奇领导工作组时采用类似反右派的方针，在周恩来和各级党委主持工作时出现了破四旧，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毛泽东下决心，不让1957年的情况重演，发动造反派，把解决党内矛盾放在第一位。当然，毛泽东也是要整知识分子的，只是放在第二位，是次重点。

第三个层次是党政军领导与不当权的群众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激化了。毛泽东利用了当时的大中学生，后来调动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斗争“走资派”。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联合起来了。造反派比较复杂。大体是以往受到伤害受过打击的人，主要是文革初被整的人的集合。用今天的标准看，文革初对他们的打击多是不公正的。造反派是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的人们，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冲击政治和社会的当权派。

后来毛泽东又收拾了大部分造反派，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就是要肃清造反派的政治影响。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一批人被整，毛泽东发动这些人组成造反派，整刘少奇。整刘少奇是一大

冤案。整“五一六”又是一大冤案，整刘少奇的人又挨了整。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前三年，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七年是收尾。

造反派与右派的关系问题：这个社会是分层次的，下层的人，政治和社会边缘的人缺少发言的机会，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批评现实，用什么做思想武器取决于社会条件。1957年的右派一是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有批判性的认识。第二种是追求革命的青年，如林希翎、王蒙这些人，他们是“第二种忠诚”：因为热爱共产党才提出尖锐的批评。造反派的初衷也是维护毛泽东、维护共产党、维护社会主义的。造反派一般不愿接受右派，尽管造反派和右派都受过当权派的打击，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情绪有某些相通的地方。说造反派与右派派在文革运动中结合，要很慎重，有这样的个案，一般情况不是这样。

文革后原参加过造反派的人有了分化。上了大学的人许多换了思想武器，要求变革社会，要求民主、自由、法治。不少人同情“自由化”派。“自由化”派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不少人曾经有造反派的经历。现在工人中仍有人坚持毛泽东主义，说“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是反对专制压迫的，但是反对专制不一定是民主运动，“大民主”给了反抗官僚压迫某种机会，但不能看作是制度化的民主，至少弊病太多。当然用“一言堂”取代“大民主”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王小东：上了大学的为什么与没上的不一样，是由于知识还是利益不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是得了好处的。而工人地位不好。

王东成：有利益问题，也有理念问题。

王小东：两种批判有什么不同？

王东成：造反派立场是批判邓小平。文化革命我17岁。我受的害是晚上了三年学。为什么有些青年人觉得文化革命好？昨天还有人发了电子邮件，说10大科学成果文化革命时期有8个，改革开放只有2项。有一个帖子说，文化革命的最大贡献是杀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他们的崽子，失误是没有斩草除根。我讲的不是史实，而是青年人的看法。即使有更多的史实出来，也没有根本作用，因为许多人看历史，是根据自己对现实的体会看的。老百姓怀念文化革命是根据现在状况，他们感觉现在不好。

我的看法，这20年科技搞得太糟糕了，官方吹牛也没用。当然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科技成果可能更多。有人说，现在搞得不好是文化革命的后果。但是青年人不这样看。中华民族本来有机会，但是文化革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比如现在这么多中国人如此仇恨中国人自己，仇恨中华民族，不是五四造成的，当时是反对传统文化。现在有人说，我们的文明是下流的文明，从人种到文明都否定了。许多人都这样看，这是由于文化革命中受到伤害的人太多了，产生非常强烈的怨恨和仇恨，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20年。

印红标：李宪源的文章讲得有道理：有些最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我访问过韩爱晶，他说他确实打过彭德怀，他为此悔恨终生。他又说，那些与彭德怀出生入死战斗过，了解他的人为什么要整他？是谁告诉青少年，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领导人异口同声说他是坏人，青少年如何去判断？有些领导人据说是违心说的，我们要问，为什么讲违心的话？对违心干的事同样要承担历史责任。只要求当时的青少年忏悔是不公平的。

丁冬：余杰让余秋雨忏悔，他忏悔不忏悔关系不大。上边也没有忏悔，只说自己受了迫害。



王小东：说全民忏悔也不合适。我为什么要忏悔。

王东成：我们打过老师。我们全体学生都向老师道歉了。

丁冬：周一良也委屈。

（未完待续）

~~~~~

## 【史料辨析】

### 是谁引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 欧阳龙门 •

目前流行的有关1967年7月“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说法（见〔1〕〔2〕〔3〕〔4〕以及附录），基本上都是采用当事人、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说法〔5〕。本文附录即是一例，其中认为“由于王力等人从中破坏”，引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本文不否认这种说法。但是，本文认为这只是引发的因素之一，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引发“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因素不止一个，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本人常常出尔反尔、乾刚独断、临时改变主意而不顾其他当事各方的做法。

由于陈再道是事件的当事人，其叙述难免有倾向，所以本文力图将有关事件的另一一些情况加以描述。

首先是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1967年7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包括江青，达成的一致意见〔6〕〔7〕〔8〕。有关这一点，陈再道是明白的，同时也是刻意回避的。现在流行的说法则有意说成只是中央文革或者王力个人的意思〔1〕，这是讲不通的。

四点指示的基调与两个月前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当时是打算比照“四川模式”来解决武汉问题，那就是：军队从支持保守派转而支持造反派，“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9〕

其次是在同意四点指示的前提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各有不同的侧重。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既有希望“天下大乱”的一面，也有希望动乱保持在一定程度之下的一面。在武汉问题上毛泽东既有比照“四川模式”解决武汉问题的意图，也有与“四川模式”

不完全相同的意图。例如，毛泽东的本意有可能是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象对成都军区的负责人那样打倒。所以，出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但是前提是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5〕

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都是力图将动乱的程度减到最低。但是，这必须以不忤逆毛泽东的意志为前提。一旦发现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周恩来总是尽力去贯彻。在处理武汉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论周恩来内心是否同意四点指示，他都要尽力去贯彻。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则代表了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的一面。对于陈再道以及各地军方负责人，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如果他们不听话，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就要通过造反派对他们展开斗争。至于斗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打倒，则还是毛泽东说了算才算数。

至于林彪，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是否参与四点指示的拟定。但是，“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林彪乐意看到的。林彪是“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受益者。

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当时中央以正式的文件发出四点指示，则武汉的局势将如同四川：保守派组织将会瓦解，造反派又会分裂、武斗。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是以这个模式结局的。但是，当时中央并没有这样做，并没有将四点指示形成正式的文件下发。于是，造反派方面通过小道消息得到了四点指示的精神，增强了与保守派对立的信心和决心。而保守派方面由于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又有军队的坚决支持，仍然坚持原有的、镇压造反派的立场。于是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武斗不断，生产、交通、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分别抵达武汉，企图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势不两立的状态下来解决武汉问题。由于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完全信任，毛泽东到武汉并没有让陈再道知道。对外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东湖宾馆作了各项安排，其中包括撤走了属于保守派的服务员，换上了造反派的服务员。〔8〕

毛泽东在7月15日和16日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处理西南各省问题的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7月15日至18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汇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引起陈再道以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对此周恩来象对待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师一样，“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等人向毛泽东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转告陈再道，毛泽东要保他的意图。周恩来还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说解散造反派“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周恩来也预见到：“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然而，由于四点指示在根本上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否定了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周恩来并没有能消除陈再道等人的抵触情绪，正如陈再道后来说的：“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5〕

为此，7月18日晚，周恩来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晋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要打倒，而且还要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但是，前提仍然是要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陈再道支持“支持造反派”。陈再道口头上也答应了。此后，周恩来离开武汉。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谢富治和王力到造反派一方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向保守派发起挑衅。保守派则因此被激怒而冲击东湖

宾馆要揪斗王力，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这里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是：

1）周恩来传达四点指示在前，谢富治和王力公布四点指示在后。尽管周恩来是在武汉军区的干部会上传达的，谢富治和王力是在会见造反派的时候公布的，其结果都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

2）四点指示并不是谢富治、王力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央的决定。

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本人在到达武汉以后，改变了主意，认为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工总”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应当实现“大联合”。为此毛泽东有一系列的指示，后来广泛地传达。诸如最有名的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还有“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等等。这就等于是推翻了四点指示的基调，但是又没有正式作出决定否定四点指示。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仍然停留在四点指示的基本精神上来解决问题。毛泽东突然提出的“百万雄师”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说法无疑为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壮了胆，增强了他们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对抗的信心和决心。

为此我们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在形成四点指示之前提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大联合，而要在正式决议形成之后才改变想法？如果说改变想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不重新召集有关人员形成新的决定？答案是：毛泽东不仅常常出尔反尔，而且常常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无法无天，随便推翻已经形成的决定。

毛泽东这种新的想法也许更为合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缓和两派的矛盾反而使矛盾加剧。设想当时的局面，我们不难看到：两派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干部战士都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蛊惑，把对方看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把双方的斗争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怎么可能接受对方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各派都善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去各取所需，寻找于自己有利的部分。

造反派刚刚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镇压，突然又获平反，加上有中央四点指示，正是士气高昂，怎么可能不去报复保守派，甚至企图打垮保守派？怎么可能去拥护把他们当成反革命而镇压的陈再道？

保守派有武汉军区的强有力支持，对造反派的平反本来就不服气。现在造反派要打垮自己，而同时又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毛主席指示，怎么可能不起而反击？在当时情况下保守派的愤怒和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法抱怨周恩来，当时情况下很多人也想不到抱怨毛泽东、即使有人想到了也不敢抱怨毛泽东。他们只好把一腔怒火发泄到王力身上。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以后局势的发展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毛泽东只好又重新回到四点指示的精神，按照“四川模式”解决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也和四川的“产业军”一样被摧毁。毛泽东当初要保陈再道的愿望也未能实现。陈再道和钟汉华都遭到撤职、批斗。林彪成为“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赢家，事件后林彪体系的刘丰成为武汉军区政委。

纵观事件的发展过程，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偏于造反派一方，边对挑起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也毫不掩饰地偏于保守派。虽然目前还没有陈再道或者武汉军区其他人直接策划“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证据，但是并非仅仅是“百万雄师”的成员参与了事件，武汉军区的基层官兵也直接卷入了事件，对此陈再道至少是未加制止，而且是幸灾乐祸的〔5〕。这也是挑起事件的一个因素。

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本人的出尔反尔是引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最主要因素。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出尔反尔是经常性的。例如，陈再道用以镇压造反派的中央指示是《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造反派用以反击镇压、争取平反的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这两个命令是直接相矛盾的，而且都是毛泽东亲自签发的。又例如，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讲话中提出：“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基于毛泽东的这段话，才有江青以后的“文攻武卫”的说法，才有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武斗，天下大乱。然后，毛泽东又才发出制止武斗，收缴枪支的指示。不过这将是本文以外的另一个话题。

参考文献：

- 〔1〕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 〔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 〔3〕权延赤：《杨成武见证文革》
- 〔4〕董保存：《政治旋涡中杨成武》
- 〔5〕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 〔6〕王平权：《就“王力事件”致人民、光明、文汇等报函》
- 〔7〕王力：《王力反思录》
- 〔8〕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
- 〔9〕《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1967.5.7.

◇ 附录：中共官方网站“人民网”所描述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的“七·二〇”事件。

1967年春夏，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的发生。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然而，由于王力等人从中破坏，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离开武汉返京。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乘周恩来离开之机，违反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指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力、谢富治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王力、谢富治的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29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

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污蔑这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与此同时，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恶潮。

~~~~~

## 【史海钩沉】

### “七·二〇事件”中的“八二〇一”与“八一九九”

·余汝信·

部队代号，是为密化部队番号真实名称而规定的代称，一般以数码、单词（字）单独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在特定的保密时段过后，大多应可解密。然而，文革距今已三十多年，虽则当年的军事单位，今天已有相当大比例撤销了番号、建制，但众多的介入地方“三支两军”的部队，其代号所隐匿的真实“身份”，至今仍难以析解，成为我们在研判文革史料时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譬如著名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的“八二〇一部队”和“八一九九部队”，就难倒了不少研究者，弄不清或弄错了这些数码所替代的部队真实番号。本文仅尝试将这两支曾经深入地介入武汉地区文革的部队之历史沿革及其在“七·二〇事件”中的主要表现，作一概述。

#### 一、“七·二〇事件”前的“八二〇一”与“八一九九”

八二〇一部队，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代号。

该师的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文革前的体制，总队受公安部队总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直接由省公安厅党组）双重领导，执行内卫执勤任务，辖三个直属团，两个专区支队，六个专、市大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总队第一政委由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挂名兼任，总队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牛、蔡两人都于1965年11月方到职，其中蔡资格尤老，1932年十七岁即参加鄂豫皖红25军，建国后长期在公安武警部队任职，历任公安19师政委，内卫2师政委，沈阳军区公安军副政委，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广东省武装警察总队、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1955年授少将军衔，惟1962年后一直在师一级位置徘徊未前，1965年11月，由广东平调湖北。

1966年2月，毛泽东指令撤销公安部队番号。6月7日，军委电令，自7月1日起，全国公安部队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在此大形势下，总参、总政于8月24日批复武汉军区，同意将湖北省公安部队整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独立第5、6团。9月12日，湖北省军区公布整编命令及番号，独立师师部由省公安总队部整编，驻武昌，下辖步兵第1、2、3、4团和轮训队，其中步兵第1团由省军区独立团整编，第2、3、4团由公安总队整编，分驻汉口、武昌、襄阳、沙洋。独立第5、6团拟拨归武汉市人武部领导，驻武汉市，次年3月，这两个团也拨归独立师领导。至“七·二〇事件”前夕，独立师有四个团的兵力驻在武汉市内。牛怀龙，蔡炳臣在整编时分别改任师长、政委，两人在后来的“七·二〇事件”中均成为知名人物。

八一九九部队，是武汉军区直辖的陆军第29师的代号。

第29师原属二野第10军建制。1951年，奉命编入第15军序列入朝。在朝历经三年，1954年5月返国，驻湖北安陆。1955年6月，武汉军区成立，随15军建制编入武汉军区序列，10月，进驻湖北孝感花园镇新营房。1960年6月，由步兵第29师改番号为陆军第29师，同年10月，代号由0049部队改为6941部队。1961年2月，军委决定第29师为武汉军区战备值班部队，时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共五个团。

1961年3月14日，军委电令15军军部及其所辖第44师、第45师改建为空降兵，原驻河南开封的空降兵师亦编入15军序列，第29师同时脱离15军建制，归武汉军区直接领导。1962年5月，第29师代号改为8199部队，下辖步兵第85、86、87团，炮兵第323团和坦克第45团的代号依次改为8205、8206、8207、8503、8204部队。1967年，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根据张昭剑后来为《河北革命将领传》一书提供的简历，其为河北栾城人，1923年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1955年9月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大校。而据29师后来编写的师史，张昭剑1962年调29师任副政委，1964年升任师政委。“7·20事件”中，张昭剑也是一关键人物。

1967年，湖北省境内仅有以上两个陆军师，这两个师，前者属地方部队系列，后者属野战军系列，在“7·20事件”中，表现各异，分别成了“支保”和“支左”的典型。

## 二、远镜头：1967年1—6月，武汉

1967年1月26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背书，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此后的武汉三镇，形成武汉军区与造反派、保守派群众组织三者之间博弈的局面。

2月8日，工总、二司等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当前局势的声明》，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武汉军区在用强力弹压区内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的同时，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责了“二·八声明”及香花派，3月17日，与公安机关联手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接着，3月21日，又发表《通告》等文件，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3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前些时候已近绝迹的保守派组织纷纷死灰复燃。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造反派伺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老谭”——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保守派也不甘示弱，于5月16日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正如陈再道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武汉军区从感情上倾向于保守派，致使军区在6月4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脱胎于公安部队，习惯于阶级斗争的省军区独立师，大部分官兵的观点与百万雄师一致，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牛鬼蛇神翻天”。据造反派后来称，本不应介入两派之争的独立师，一些人参与了“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组织领导工作，而百万雄师最主要的口号正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所谓牛鬼蛇神，当然就是指造反派中人了。

5、6月间，武汉地区两派武斗不断，6月中旬后更趋剧烈。6月17日始，连续出现汉

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北京的来电有利于造反派，6月28日，武汉军区也不得不发出《通告》以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但聚集于武汉上空的阴霾并未因此而散去。

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2月28日，陆军第29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陆29师此前并无介入地方“支左”，与湖北地方关系不深，对于武汉两派态度亦较为中性。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知道这一应该是武汉军区制订而得到军委首肯的调动方案的真实意图，我们只能推测，将29师调至军区大院侧旁，当初大概有拱卫军区指挥机关之意，惟这一调动步署客观上却打破了省军区独立师在武汉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为后来“7·20事件”的进程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

### 三、中镜头：1967年7月上中旬，武汉

剑拔弩张的“7·20”前夕武汉局势，陈再道、王力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似已述之甚详。不过，陈、王都不免会站在各自立场说话，好在我们今天还有此时期大量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及其他渠道资料可供参考，从而可以从更客观的角度将事态的演进过程重新组合如下。

7月6、7、9日，周恩来等连续在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7月10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周事前是知道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名电报的，因该电原拟“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来京汇报”。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将责任归之康生一人，应不妥）。

7月13日晚，周恩来电话告正在重庆代表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谢富治，要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提出同行的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周同意。次日中午，谢等抵汉（以上是王力的说法。陈再道说王力与关锋“经过密谋策划，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来”，亦应与事实不符）。

7月14日晨2时半，为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离京飞武汉，随行的有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抵汉后，周先后同武汉空军及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周本人及毛抵汉的准确时间，事前并未告之武汉军区，毛在汉期间的安全，周亦令武汉空军负责（中央对武汉军区的不信任程度于此可见一斑。陈在回忆录中说他心里很纳闷，周来武汉“是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不知他们为什么有意不让我们事先知道？”其实，应是周本人不让武汉军区事前知道）。

晚，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入住东湖客舍内梅岭一号，随行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中午抵达的谢、王等住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于东湖客舍乙所。

晚10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学校门口看大字报被认出，谢、王等不得已与在场的群众进行了谈话，之后，又于11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钢二司”部分群众进行了交谈。

7月15日晨，毛找谢、王汇报西南情况，后又找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一并听取了汇报。毛在此间提出了中央确定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指示要先从部队解决，并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18日，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主持武汉军区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王力称这次会议为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本文从陈再道说）。周在经毛审阅同意的会议讲话中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以上是王力回忆录及当时造反派出版物的说法，陈再道回忆说毛当时的指示称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分析，应以前者为确）。

7月15—17日，谢富治及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等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希望两派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月18日，晚，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这是毛14日抵汉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陈、钟）。毛在召见时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要武汉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当即返京。临行前，周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毛的安全，具体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

7月19日凌晨，在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王力、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总部，谢、王重申了前两天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时的讲话精神。

下午至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讲话精神，王力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至深夜11时多方散会。

百万雄师一对谢、王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处的讲话极之不满，反应强烈，他们并不了解那是毛、周亲自定的调，将其归罪于谢、王（主要是王）。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客舍的两条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水泄不通。

#### 四、近镜头：7月20—22日，武汉

有关“7·20”前后数天的情况，陈再道，王力已有回忆录可资参阅。以下陆29师及省军区独立师“7·20”当天及7月21日的行动情况，引自于陆29师当年8月4日整理的《七·二〇叛乱实况》，亦可供研究者参考鉴别。

20日凌晨3时多，29师突然接到“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此时，百万雄师一派的“公检法”系统十几人已进入“中央首长住所区”，29师部队当即进行劝阻，事态稍为平息。



清晨6时左右，在原警卫东湖客舍的独立师一部分人的引领下，更多的百万雄师派一群群人冲进了东湖客舍，张昭剑用身体抵挡百万雄师的群众不果，左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百万雄师人多势众，王力及随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红卫兵全被架上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四号楼。

张昭剑在东湖客舍安顿好部队，立即乘车赶赴军区大院，此时王力已受到围攻殴打，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张昭剑一直紧跟王力周围，立即组织了驻军区大院的29师侦察连、四连、六连，分布在四号楼内，堵住了大门、侧门与楼梯，对向楼上冲的百万雄师群众进行劝阻。

下午2时多，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人，29师指战员用身体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掩护，楼下接应，搀扶着重伤的王力下楼，上车后冲向二号营门，部队乘机以班为单位，悄悄撤离了四号楼。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仍留在四号楼与百万雄师的群众周旋，后也安然撤出。

下午3时许，王力乘车来到29师机关驻地，住进六号楼。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地，到黄昏时，情况越来越紧张，张昭剑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部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附近洪山树林草丛里，王力刚离开六号楼，独立师的一些成员就冲进了六号楼，逼29师交出王力，遭到拒绝。

21日，凌晨2时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一些人两次冲进29师机关驻地，包围并冲进了二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再三威逼29师交出王力，并扬言要搜查，29师领导当面予以斥责，独立师、百万雄师无功而还。

王力在张昭剑、保卫部王科长陪同下，在遍地荆棘、野草丛生的山坡上渡过了一夜。上午，张昭剑只身下山，来到29师所属七连，说明了事情经过后，将王力安置在七连驻地。

下午2时多，武空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七连在29师张绪师长、解立根参谋长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冲过封锁，顺利地把王力送到官山武空司令部驻地。

以下，为综合各种资料重新整理组合的一个时间表。

7月20日上午，北京，周恩来在林彪处开会。下午，周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距武汉市60多公里、受武空严密控制的山坡机场。

同日，奉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第44师132团，第45师133团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

下午，邱会作乘专机抵汉。下午5时多，邱见到了仍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并转达了林彪、江青的意见，请毛转移到别的地方，毛考虑再三终同意。晚8时多，毛决意去上海。

7月2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毛泽东乘坐武空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的秘密护送下，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打破自1957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乘空34师专机到上海。

7月22日凌晨3时多，王力在李作鹏和刘丰护送下，从武空司令部驻地转移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回忆说，周与其见面时，“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

上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叶明、孔庆德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让叶明、孔庆德住到29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工作，并让他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攻。

王力回忆说，周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谢、王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谢、王。

王力后来还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7·20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以至这种激化反映到军内来的一次总爆发。弄得不好，这种激化会蔓延至全国各地，甚至演变为内战，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惟始料不及的是，“7·20事件”对毛本人思想上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启机，使毛看到了事态演变下去的严重性，促成了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从“乱”走向“治”。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王力这位“7·20”的英雄，在一个月后却不可思议地成为毛为实现其急转弯的“战略部署”而抛弃的替罪羊。

## 五、“7·20事件”之后

7月23日凌晨3时，在周恩来草拟的、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中，要武汉军区十五人（包括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及支保的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去北京开会，自此，陈等实际上已“靠边站”。

同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迁至汉口原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29师所控制。

7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8月3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领导。及后，独立师撤出武汉地区，移驻应山、黄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训”。当时，社会上有传闻称独立师因“7·20事件”被撤销了番号，不确（独立师是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大量裁减地方部队后方撤销建制的，此际距“7·20事件”已有八、九年，与“7·20事件”无关）。

8月15日，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15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同时，将陆29师划归空降兵第15军建制。

同日，军委命令，空降兵第15军军长赵兰田调任武空副司令员，副军长方铭任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纯青任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原军政委王新已于8月6日调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方铭任主任，张绪、张昭剑等任副主任。

1968年7月13日，军委电令，由武汉军区组建一个军部，番号称陆军第17军，将陆军第29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1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拨归该军建制领导，河南省军区独

立第1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依次改称陆军第50、51师，陆军第29师番号不变（翌年12月，改称为陆军第49师）。9月7日，军委令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张治银为陆军第17军军长，张昭剑为军政委。张昭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从师政委擢升至军政委，与其在“7·20事件”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1972年11月24日，军委电复武汉军区，同意撤销陆军第17军建制。该军撤销后，陆军第49师重新直属武汉军区建制领导，陆军第51师改编回湖北省军区独立师。

1976年3月20日，军委电令，调陆军第49师归兰州军区陆军第19军建制领导，番号改称陆军第56师。同年4月，撤销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建制。

最后，交代一下“7·20事件”的几个主角后来的情况。陈再道、钟汉华于1972年5月同时恢复工作，陈降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数年后，又重新担任大军区正职职务，陈先后任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先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于1973年3—4月间同时恢复工作。牛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巴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8年5月，蔡炳臣调升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同年8月病逝。

张绪，1978年1月由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调任武空司令部副参谋长，1983年离休。张昭剑，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陆军第17军政委，短命的17军撤销后，未及50岁的他却未再有新的任命。正所谓此消彼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对张昭剑在“7·20事件”中“听空军的”、“将王力藏了起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陈再道，逐步恢复了权力，而仕途上曾经得意一时的张昭剑，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好日子过了。（2005年1月）

#### 主要参考书目

- 1、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 2、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 3、湖北省军区军事志编辑室：《湖北省志·军事》人民共和国部分送审稿，1993）。
- 4、湖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湖北省军区政治部，1988）。
- 5、陆军第56师军史编写组：《陆军第五十六师军史》（陆军第56师，1985）。
- 6、《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〇”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 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卫兵师（筹），1967年8月于武汉）。
- 7、《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7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1967年8月）。

~~~~~

#### 【运动记愧】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我为什么残忍？

• 鲍河扬 •

人痛苦时有多种的解脱：或死亡，或突然来了幸福的事，或向好友诉说，但限于受害的痛苦，若是害人的痛苦，除死亡，突然的幸福和诉说都是徒劳的。害人的残忍常在幸福时显现，愧疚总是难以张口。

我长时间的被愧疚折磨。三十八年前，我刚满十四岁，就突然地着了魔，疯狂的残忍，抄陌生人的家，用皮带抽陌生的人，每当想起有我参与的血腥场景，心就在谁也不知道中刺痛，并在意识中快速逃离紧追索我的血腥。意识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在瞬间远离，又在瞬间回到过去。

三十年前，我为反对我的残忍和攻击那时代的残忍而坐牢，判刑，劳改，却也无法驱散这幽灵的折磨。我想已到了断的时候了。

怎样了断？忏悔虽是办法，但不是根除，不除根的树，未来依旧是树。忏悔有减轻罪恶感的自私的味道，如同抛弃了伴侣，说声对不起，为的是能安心的新欢，在寻索了断的办法时，我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年轻人，从小被母亲娇纵，最后犯了死罪，上刑场前，年轻人提出吃一口母亲奶水的请求，被准许了。年轻人将母亲的乳头狠咬了下来。我已露出龟一般的齿，寻找哺育我残忍的乳头，将他咬住。

走过来的人大都说，这场灾难是“四人帮”制造的，这话太夸张了，是对生命和民族还有受害者不负责的推卸。

受骗能使人以错误反对正确，不会使人残忍。被害人控诉受了迫害，害人者哭诉受了欺骗，就结了死伤千万人的十年的大案，这过于草率了。这是生命依旧在被轻蔑中继续。

也许残忍是因为我崇拜毛泽东？但我回忆血腥场景，追捕抡皮带时的动机和潜意识，绝无崇拜的参与。

也许有人猜疑我天性残忍，这就更错误了。我天性懦弱，上小学时常被欺，女生都能不客气。我的小学《北京香山慈幼院》是一所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这类学校的通病是大的欺负小的，强的欺负弱的。我六岁上小学，小学毕业身高一米四四，自然是弱的。所以我憎恨欺负，向往相互尊重。也许有人解刨我是受害者的报复，但我不是，考入汇文中学之后，那里校风很好，没有欺负人的现象，生活和学习都非常愉快。我的残忍不是因受虐而成了虐待狂。我的本性是懦弱的，运动过后，这本性又显现出来，并几十年的统治和左右着我的命运。

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老兵抄家和打人最残忍，因为他们大都是干部子弟，是长期和骨子裡的优越感的喷发。我想说这话的定不是这个阶层里的人。老兵残忍是事实，但不是因为优越感。那时学生只尊重和敬佩学习优秀，体育出众的人。文化大革命干部子弟才有了优越感。但优越感不会使人残忍。

这一切都不是残忍的理由，但我非常的残忍，追查下去，任何的残忍都离不开仇恨的驱动。

我的仇恨来自于从小受到的反人性的教育。

个体生命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应至高无上，但几十年的教育却说个体生命微不足道，阶级和国家才是一切生命的主宰。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光辉不是来自于生命本身，而是源于阶级，民族和国家。那个时代的人民，已不承认，甚至不相信还会有个体的生命。不以个体生命为至高的民族，极容易煽起仇恨。不推崇自身生命的人，也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

在我学过的课本里，从未歌颂过生命本身，令我冲动和为榜样的全都是为了阶级为了国家的生命，似乎生命一旦离开了群体阶级和国家就卑微了。

“四人帮”推行个人崇拜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策划和制造仇恨。个人崇拜的基石就是对另一些生命的仇恨。“忆苦思甜”是血腥的序幕。一旦否认了个体生命的至尊，就容易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地富反坏右被打倒，他们肯定仇恨剥夺者，后代也肯定仇恨。这就是反人性教育的结论。受毒最深的就是干部子弟，因为他们的父辈与那些人有着几十年的血仇。

当我从阶级和国家的圈子里跳了出来，以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对话时，我竟然喜欢起我曾仇恨的人，几乎所有的地富反坏右都值得亲近，信赖，或是同情。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歌颂遇罗克，我不仅喜欢已是敬重他的人品了。我曾因为《红岩》书中的沈醉而变的残忍。十几年后，父亲与沈醉同在全国政协一个组，俩人成了朋友，经常相互走动。我有机会近他之后，竟然发现他是个正直，人品高尚，有正义感，有骨气的和善老伯。个体生命凌驾与一切之上的时候，个人的价值超过宇宙的价值的时候，便是对人性的尊重和人性解放之时。我作过调查，我的老家河北丰润县有近千名地主，真正的恶霸只有三个。

反人性的教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使我和许多人，高举着阶级和国家的大旗，以理想的名义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极真诚的行反人类的法西斯之道。

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于是红卫兵开始杀人。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一夜就封土活埋和屠杀了近百人。红卫兵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地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多户人家被杀绝，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出生38天。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始于“四人帮”，更是根植于接受了反人性教育的人民。

当今流行于世界的“恐怖主义”者，大都是无私无畏，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生命的人，他们定是对同胞充满了深情的爱，但他们是凶残的。

我们民族的个体生命，不是这几十年，而是被轻蔑了几千年，在三纲五常的神圣说教中，在以阶级和国家的革命的名义中给扼杀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若不以个体生命为至高至尊，就不能有民主，否则是更加的混乱。民主的基石之一，就是推崇比民族和国家更重要的个体生命。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是大的飞越，与民主党，共和党及等等的党已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学习的过程走了样，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学习。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日本著名的《每日新闻》在评价这次奥运会日本队的表现时称这届奥运会造就了“新一代的日本人”。站在领奖台上的日本运动员，脸上荡漾的不是“为国征战”“背负国家荣誉”之类的悲壮。不管是微笑还是流泪，表现出来的都是为自己长时间的努力最终获得回报而产生的满足感。

“还是自己比较重要”，这就是男子柔道100公斤以上级的金牌获得者铃木桂治干脆利落的回答。还有一名运动员更清楚的意识到要做个真正自由的竞技者，他就是男子射箭银牌得主山本博，在奥运会之前他就说：一心想着肩负着祖国的重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我要超越这种

境界，找其他的动力。这个其他，他虽没说明，但他在比赛中使用的器械上贴了大儿子的照片作为护身符，家人没有给他带来负担，反而为他减轻了压力，让他轻装上阵。

“我是为了自己”，说这话的人在过去的奥运会里也有过。1966年的奥运会，千口十铃声称“比赛是我用来享受的”而饱受非议，今天已没有人说三到四。《每日新闻》的评论最后说，这批新一代的日本人，在雅典奥运赛场上的诞生“令人欣喜”。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位朋友不能忍受的说：难道爱国主义也成了反人性的主义。我说爱国主义不应源于道理，而是来自于对自身生命的崇敬和热爱。将爱国主义高悬于个体生命之上，就是反人性的爱国主义，必是生命的悲剧。

我的另一位朋友也不能接受的说，若吹捧个体生命，中国将腐败。这是错觉，如同文化大革命时的文学，接吻和床上的事是下流的道理一样。“自我”几乎被儒家残杀的已断子绝孙，文化大革命到了颠峰，私心已是罪恶。所以自私，怯弱，惟利是图，成了“自我”的代名词。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颂扬的是个体生命的张扬，震撼我的是力量的美，情欲的美，还有追求未知的美，是人类与大自然的亲近。而我们几千年追求的就是三纲五常，一辈子学不完的道理。退化了本性的人民，巩固了历代王朝的统治，但无能于外族的侵略。中国的哲学也是一本厚重的书，先哲们探索着阴与阳，正与反，祸与福，大与小，生与死，上与下，美与丑，我从中什么都可以找到，惟独找不到个体与群体辩证关系的宏论，不知是眼盲，还是被“文字狱”吓住了，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中国哲学几千年的独裁者“天人合一”，将活生生的人消融在“天”里了，个体的人，离开了“天”，就无法确认他是人，或者说他就不是人了。中国几千年只有“天理不容”，无“人理不容”，可悲的是被杀之后，还在高喊“天理不容”，奴才般地乞求“天”的“灵光”。

就连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上过学的动物，都涌动着生命的美感，何况人类？

没有个体尊严的爱国主义是不牢靠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中，汉奸和伪军比日军还要多的原因之一。

我不相信当个体生命有了至高的尊严时却不爱国。

没有个体尊严的爱国主义是可怕，可怜，可悲的，他能使人品德高尚的去残害人类，残害生命。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